

台湾学术丛书

中国近代思想与 学术的系谱

王汎森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此处为书籍正文内容，因文字过小且模糊，无法准确转录。通常为书籍的序言或第一章内容。）

台湾学术丛书

中国近代思想与
学术的系谱

王汎森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王汎森著.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9

(台湾学术丛书/陈平原主编)

ISBN 7-5434-4306-6

I.中… II.王… III.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IV.B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2203 号

书 名	台湾学术丛书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作 者	王汎森
责任编辑	刘 辉
装帧设计	刘 昕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天润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45 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875
字 数	288 千字
印 数	0001—3000 册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306-6/1·611
定 价	19.3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本不该为区区海峡所隔绝。可很长时间里，由于政治环境的制约，海峡两岸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本上分途发展，缺乏必要的理解与沟通。这种局面，目前已有很大改观。两岸学者的你来我往，已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对各自的学术思路及发展路向，双方也都有相当的了解。由此而引发相互间的借鉴、补充乃至竞争，对学术的正常发展，均有益无害。

可惜的是，虽然大陆的学术著作早已纷纷登陆宝岛，台湾学人的研究成果，至今仍不大为大陆学界所熟悉。关键在于，与各种“台湾文学丛书”此起彼伏形成鲜明对照，大陆出版界明显冷落了台湾学人的创造性劳动。这就难怪，除了私人馈赠及大图书馆的少量收藏，大陆学界难得一见台湾同行的著述。

厚重的专业著述，固然不及轻灵的流行歌曲

或散文、小说读者面广，可更能体现一时代一区域文化人的社会关怀、历史意识以及哲学思考。完全撇开台湾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我们很难理解今日台湾的文化、思想、学术乃至政治与经济。

打破长期的隔阂，让台湾学者所创造的思想文化资源也能大陆知识界所共享，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本丛书希望积以跬步，先从目前活跃在台湾学界的中生代入手，逐渐推广扩大，使之成为展现五十年来台湾学术建设的窗口，也为日后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供方便。

本丛书的选目，暂以人文研究为限，希望兼及在台湾学界已经产生影响与在大陆学界可能发挥作用的著作。至于研究方法和学术路数，则不问新旧中西。

为方便大陆读者，各书附录作者的问学经历及著述年表，以便有心人按图索骥。

陈平原

1998年8月5日于边陲旅次

自序

收在这里的文章并不是有系统地写成的，它们有的是受到刊物主编的邀请，有的是为了特定会议而写，因此先天上有了两种限制。首先，因为刊物篇幅的限制，所以有些文章只是点到为止，将意见配合材料大致说一下而已。第二，正因为这些文章是随著不同的机缘而写成的，所以并没有一个系统。我所以将它命名为《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是因为这些文章中似乎仍有一条线索：从晚清内部思潮的变动开始。方东树的例子，是讨论方氏对汉学的攻击在晚清思想史中之意义。方氏此举，显然并不只是理学的回潮，同时也代表了新时代的动向。邵懿辰则是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先声。他的一些论点，代表了在时代的催化之下，传统内部的思想因子产生了分子变化。太谷学派的出现则代表当时的小知识分子利用传统的学术资源，以因应时代困局的一次

并没有成功的努力。这三篇文章，各自从不同的侧面，说明晚清学术的不同面貌；《清末的历史记忆》一文则在说明晚清汉族历史记忆的复活如何改变当时的政治文化，同时也讨论了新的历史记忆资源如何颠覆了官版的历史记忆，而为晚清的历史变动埋下种子。以上四篇文章分别谈清季上层及下层知识分子的四种变化，它们设定了一个背景，并作为以后诸篇文章发展的张本。

其次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其中的三篇：《从传统到反传统》、《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都是提纲式的文字。《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一文，尽管是针对特定的现象而写，但也可以看做是从特定的角度来说明“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路径。《“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一文，则用来说明“思想资源”之转移以及“概念工具”的变动如何改变当时的思想界。但是我决不是想通盘讨论当时中国文化中的日本因素，而且也没有能力这样做。我只是想说明，如果不考虑“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之变化，则当时思想界的变迁就难以理解了。《刘师培》一文，说明西方的学说如何能以中国的面貌出现，而中国当时的困境又何以能够逼使这类思想更易于为人接受。同时，从刘师培身上可以看到一种两难，一方面是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一方面又是反传统的传统主义。从他身上还可以看出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学者挣扎于一个艰苦时代的痕迹。

第三部分，“‘建立一个学术社会’：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志业与命运”，则是在现代世界中，传统中国的仕、学分途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此一期中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士大夫，其中一些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寻找到了他们的新任务：“建立一个学术社会”（顾颉刚语）。读者会发现这一组文字

大多和傅斯年有关。傅斯年当然不是“建立学术社会”的惟一代表，但他毫无疑问的是一个灵魂人物，而我个人恰好对他做过比较集中的研究，自然也就多写了几篇和他有关的文章。在这一组文章中，《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是姐妹作，它们都讨论古史多元观的形成与传播，我希望用它们作例子来说明一个学术诠释典范的形成。而在当时的学术界，有许许多多这种新诠释典范出现。此外，这两篇文章也可以看出现代思想中讲多元、强调变化的观念如何体现在学术研究上。《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一文，则以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例，说明他成学的经过、他的志业以及当时学术界“新”、“旧”、“公”、“私”之间的纠缠与冲突。《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一文，则以一件事例来说明学术上从旧到新的转变。上列各文直接或间接说明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学、仕途后建立一个新“学术社会”的努力。

此书大致编于1999年春天，之后因种种理由，迁延再三，书中有两篇文章也不得不割爱。在此期间，台北的联经出版公司鼓励我出一个繁体字本，书名相同，不过其中多出四篇文章：（一）汪悔翁与《乙丙日记》一兼论清季历史的潜流（二）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三）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四）“主义崇拜”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以陈寅恪为中心的考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

在编辑这本小书的过程中，我曾对其中的一些文字加以删改；为了使眉目更为清楚，几篇文章的名字也作了更动。《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原题为《方东树与晚清学风》。清季的社会政

治与经典诠释——邵懿辰与《礼经通论》，原题为〈邵懿辰与清末思想的激烈化〉《“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戊戌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原题为《戊戌前后思想资源的变化：以日本因素为例》。《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刘师培与“社会主义讲习会”》原题为《刘师培与清末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一文原题为《读“傅斯年档案”札记》。此外，我也对几篇文章的副标题作了增删。《传统与反传统》一文发表在《当代》一个讨论反传统思想的专辑，主要是综合我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书的一小部分及《章太炎的思想》的一篇附录而成。当时因为尊重专辑的体例，所以把注去掉了。《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有一篇姐妹作《历史记忆与历史：以中国近世史事为例》发表在《当代》九十一期（1993），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有关太谷学派的一文，发表于1994年，当时并未能直接读到太谷学派的经典，而是以回顾二手研究的方式写成，所以迳注页码在文中。该文主要是想探讨它在晚清思想脉络中的意义。

对我而言，将不成系统的散篇收集出版是一件痛苦的事。多年前与台北的允晨出版公司签订了一张契约，言明要编成一本近代思想史的论文集，但这件事一再延搁，始终不曾付诸行动。如果没有陈平原兄的苦苦催逼，我大概是无法辑成这本小书的，在这里要谢谢平原兄。我也要感谢我的老友刘季伦先生，他对本书的编辑过程费过很大的心血，提过宝贵的意见。编辑此书时，我个人适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作客，我也想趁这个机会感谢系中的朋友们。

王汎森

目 录

传统思想与学术内部的危机

- 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 (3)
- 清季的社会政治与经典诠释
——邵懿辰与《礼经通论》 (27)
- 道咸年间民间性儒家学派
——关于太谷学派的研究 (46)
- 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
——以章太炎为例 (71)

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

- 从传统到反传统
——两个思想脉络的分析 (91)
- 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

——兼论思想的本质与思想的功能·····	(117)
“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	
——戊戌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	(149)
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	(165)
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	
——刘师培与“社会主义讲习会”·····	(197)
思潮与社会条件	
——新文化运动中的两个例子·····	(220)

“建立一个学术社会”：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志业与命运

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

 ——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的

 《夷夏东西说》····· (263)

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 (283)

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

 ——读“傅斯年档案”····· (311)

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

 ——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 (344)

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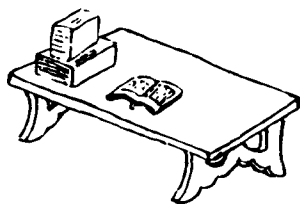
傅斯年与陈寅恪

 ——介绍史语所收藏的一批书信····· (385)

作者简历····· (395)

著作目录····· (396)

传统学术与思想内部的危机





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

近人因为受到西洋汉学家“冲击—变化”模式之影响，故讨论近代思想的变化时亦每喜自鸦片战争开始，视之为近代思想变化之起点，但事实上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内部已经面临了各种挑战。

挑战是从几方面来的。第一是内治的问题，动乱接踵而来，各种制度也出现问题，尤其是风俗道德方面，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官僚的贪污腐化，在《李星沅日记》、《道咸宦海见闻录》等书中都可以充分看出。正因为人们对贪污腐化触目惊心，所以会出现像魏源等人的“挑菜会”以及倭仁等人的“吃糠会”。^① 第二种挑战是鸦片及外夷的问题。

当时传统学问也起了种种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很复杂，有的是因为学术本身内在的发展而起：汉学内部出现了许许多多

^① 关于挑菜会，见梁章钜《浪迹丛谈，续谈，三谈》（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201，《人日以七种菜饷客，约同人和吃》及《人日叠韵诗》。

因内在问题而产生的所谓“典范危机”。但最重要的是知识与现实、知识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当时知识分子有一个疑问：为何考证学如此发达，出版的书这么多，而现实世界如此龌龊混乱？这个现象显然与清初大儒的主张相违背。清初大儒说，研求圣经贤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再返三代之治。清季学者开始质疑这个大前提：为什么将三代社会的真相弄得愈清楚，似乎也愈不可能实行？是因为人们不肯留心致用，还是因为六经的社会与清代社会已经完全不同，以致不可能将六经原原本本实行于当世？简言之，这时候产生了一种深刻的“知识与现实世界断裂”的危机感。人们怀疑当时居学术界主流地位的汉学考据，究竟与现实政术及道德风俗有何关联？这一门学问是不是完全失去了现实关照性，以至于学术自学术、社会自社会，汗牛充栋的考据学著作非但不能为现实世界带来一尺一寸的进步，反倒有恶劣的影响？

在《书林扬觝》一书中，方东树便将当时学问与现实世界的巨大断裂说得非常坦白，非常激烈。这本书虽然是在道光十一年刊行的，但发愿撰写则在道光五年的春天。他说当阮元（1761—1830）创建学海堂书院之次年，阮氏首先以“学者愿著何书”策问堂中学生，方东树听了觉得非常感慨，他认为这个问题大错特错，阮元不应该只问学者想写什么书，而不问所著的书有什么用。故他慨叹后世著书太容易，“殆于孔子所谓不知而作者”，乃发愤写了十六篇文章，其中有不少直接或间接批评清儒拼命著书而不管现实世界的风气。他在终篇中说：

藏书满家好而读之，著书满家刊而传之，诚为学士之雅素，然陈编万卷，浩如烟海，苟学不知要，散精耗神，与

之毕世，验之身心性命，试之国计民生，无些生益处，……此只谓之嗜好，不可谓之学。^①

这段话必须放在道光学术的背景下看。方氏是针对乾嘉学者拼命考证著书，只管在学术社群中树立地位与声望，而不管他们的专业研究与整个社会的福祉是否有任何关系而发的，所以他说那样拼命著述，如果“验之身心性命，试之国计民生，无些生益处”，则只能说是“嗜好”，不能称之为“学”。所谓“学”，照传统儒家的理想，应该是承担天下国家的实政实务。故他说：

君子之学，崇德修愚辨惑，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修之于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达则兼善，明体达用，以求至善之止而已，不然，虽著述等身，而世不可欺也。^②

方东树代表道光年间一大批希望转弦易辙的士大夫共同的想法。他们都不满意当时学问的性质以及学问与社会的关系，他们想追求一种理想的人格，简言之，一种整合政事、文章与道德为一的整体观念。

他们也为宋学，乃至整个宋代伸冤，认为许多考据学领袖

① 方东树：《书林扬榷》，在《书目类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第九十二册，总页 41516。

② 同前书，总页 41517。

无情地攻击宋学，乃至“使有宋不得为代，程朱不得为人”。^①他们认为宋学不但是中国学术的高峰，而且宋儒对先秦儒家的把握，其实是最高明的，宋儒对现实的关照也远胜于考证学者。这一个将文明发展之注意力由汉转向宋的方向，是清代后期思想史中一个关键性的变化。

以上这些观点基本是鸦片战争以前知识圈中的一个“意见气候”(climate of opinion)。不过毫无疑问的，鸦片战争的失败，使这一发展变得更加激烈。如果不能掌握上述的“意见气候”，便不能了解方东树的思想倾向，而如果不能掌握方氏的思想倾向，就不能了解他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写出了《汉学商兑》这部奇书。

—

在这里我要先用《仪卫轩文集》中的材料，来说明方东树的思想意趣，然后再谈《汉学商兑》。

方东树尊宋颂宋的态度与桐城文派有关。他的父亲是姚鼐(1732—1815)的学生，而他自己也曾经长期从学于姚氏；他的交游圈基本上也以桐城文派为主，这些人都看重朱学，对于陆王不能没有怀疑，^②对于考证学，则常持激烈批判的态度。方氏在许多著作中都透露了他尊朱的热情，如《重刻白鹿洞书院学规序》：

① 朱雅题辞，在《〈汉学商兑〉题辞》，方东树：《汉学商兑》(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页1。

② 在方东树：《仪卫轩文集》(清同治年间刊本)卷五，页12《重编张杨园先生年谱序》中他说：“自朱子而后，学术之差，启于阳明。”